

西學東漸研究

第八輯

广州与明清的中外文化交流

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 主编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西學東漸研究

第八輯

广州与明清的中外文化交流

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 主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学东渐研究. 第8辑, 广州与明清的中外文化交流/
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ISBN 978-7-100-17509-8

I. ①西… II. ①中… III. ①西方哲学—文集 ②西方
哲学—影响—现代化—中国—文集 ③东西文化—文化交流
—广州—明清时代—文集 IV. ①B5-53 ②D61-53
③G1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97939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西学东渐研究
第八辑
广州与明清的中外文化交流
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509-8

2019年8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9.75
定价: 66.00 元

西学东渐研究

主 编

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

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为序)

蔡 禾	陈春声	陈少明	程焕文	程美宝
杜维明	关子尹	洪汉鼎	黄见德	李明辉
李 萍	梁庆寅	林 岗	刘笑敢	刘昭瑞
梅谦立	倪梁康	沈清松	王 宾	吴义雄
张西平	张贤勇	张志扬	赵仪文	

责任编辑：马永康

编者的话

前几辑的《西学东渐研究》，均以某一思想的中外交流为主题。与此不同，本辑以广州场域为主题，属于地方性研究。这种地方性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具体人物脉络，有助于细化认识地方社会的不同人群与机构（地方政府、知识分子、平民与其他宗教团体）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反应和改造。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地方性的研究主要涉及《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主要口岸，如上海、天津等，然而对广州，尤其是条约签订前两百年其与中外文化交流之间关系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这对于全面把握中外文化交流而言无疑有所不足，有必要做进一步推进。此外，我们在2016年成立了“中山大学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随后被广州市社科联确立为广州市社科重点基地之一。研究中心的主旨是推动研究广州场域发生的中外文化交流现象。为了拓展相关研究，也为了配合研究中心工作的开展，中山大学哲学系、西学东渐文献馆、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在2017年6月17—18日联合举办了“广州与明清的中外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会议收到了15篇参会论文，分别从哲学、历史、社会学、建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围绕主题做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本辑《西学东渐研究》主要收录了此次会议的论文，其中个别文章虽然不是会议论文，但与此主题相关，也一并收录。期待这些文章的结集，能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在广州场域发生的中外文化交流现象。

另外，我们增设了一个研究专题：“沙勿略与中国之门——上川岛。”这个研究专题共有三篇文章：第一篇是《沙勿略与庞嘉宾》，介绍了“伟大的东方使徒沙勿略”及改建沙勿略墓园的庞嘉宾的生平；

第二篇是《1700 年上川岛沙勿略墓地的改建与庞嘉宾的报告》，分析了 1700 年庞嘉宾对上川岛的地理和人口及墓园的计划和改建过程；第三篇是庞嘉宾的报告《关于 1700 年在上川岛为伟大的东方使徒方济各·沙勿略建造的墓园》原文，首次由梅谦立等从拉丁文原文翻译成中文，并提供了初步的注释。这个专题研究，有助于了解上川岛的基本历史情况以及沙勿略墓园的改建过程。

本辑《西学东渐研究》的出版，得到了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及中山大学“三大建设”的资助，特此致谢！

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

2018 年 7 月 14 日

目 录

《天主实录》各版本情况及创作源流浅析	王慧宇 (1)
耶稣会士罗明坚与儒家经典在欧洲的首次译介	梅谦立 王慧宇 (20)
广州视野下的明季海上交通史籍及其史源	
——以《东夷图说》《诸夷考》为中心的考察	代国庆 (34)
1685 年路易十四遣华耶稣会传教团信件中的广州	蓝 莉(Isabelle Landry-Deron)撰;郭丽娜译 (46)
请孔子作证:《中国哲学家孔子·前言》对利玛窦传教策略	
的辩护	汪爱才 (57)
认同与诠释:康熙特使艾若瑟在广州之墓及其时代意义	
的变换	梅谦立 (74)
从广州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	
——16—19 世纪中国艺术品贸易	胡纪伦(Cesar Guillen-Nunez)撰;祝海林译 (93)
中法战争期间的清政府与在穗法国教会	陈 静 (104)
广州圣心大教堂的设计和建造	马崇义(Matthieu Masson)撰;朱志越译 (116)
掩藏于圣心大教堂的光芒之下	
——踏查及认知晚清广州其他基督教建筑	高曼士(Thomas Coomans)撰;朱志越译 (162)
岭南近代教堂神圣空间的解读	
——以广州圣心大教堂和东山堂为例	朱志越 (193)
1900—1930 年广州慈善柴捆	狄明德(Dominique Tyl)撰;李蓬云译 (214)

被遗忘的近代西学先驱

——19 世纪前期广州地区民间西学接触者研究

..... 祝海林 (225)

康有为的纪年构想 马永康 (237)

晚清伊索汉译的再英译和仿写 姚达兑 (252)

专题:沙勿略与中国之门——上川岛

沙勿略与庞嘉宾

——两耶稣会士在华传教传略

..... 杰德·特莱夫撰;杨小刚译 (273)

1700 年上川岛沙勿略基地的改建与庞嘉宾的报告

..... 梅谦立撰;黄志鹏译 (283)

关于 1700 年在上川岛为伟大的东方使徒方济各·沙勿略

建造的墓园 庞嘉宾撰;梅谦立注;黄志鹏译 (288)

《天主实录》各版本情况及创作源流浅析

中山大学哲学系 王慧宇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开启了东西文明第一次相对平等意义上的对话。而作为首位叩开中国大门,进入中国内陆定居的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其历史地位及学术地位一直未被学界充分重视,他本人更多的是被以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同伴”身份一笔带过。与此相应,他创作的《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简称《天主实录》),虽为第一部西方人用汉语写作的专著,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与肯定,进而也缺乏针对性的研究。

近几年来,学界已开始关注罗明坚及其著作,但相对利玛窦及其他传教士,对其研究仍不够系统、细致。相关研究以历史性的研究为主,鲜有深入罗明坚著作分析、探究其思想内在价值者。本文将简述现存《天主实录》各版本概况,梳理它写作初期的相关背景情况,重点分析中文《天主实录》和拉丁文 *Vera et Brevis Divinarum Rerum Expositio* (下文简称 *Expositio*) 的异同,希望借此理清《天主实录》的创作脉络,进而探讨罗明坚及《天主实录》在“西学东渐”开创期的重要价值。

一、现存各版本《天主实录》

作为向晚明中国人系统介绍天主教教理教义的专著,《天主实录》现有三个中文版本存世:

版本一,现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编号为 Jap.Sin I, 189, 书名为《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根据其中“万历甲申岁秋八月望三日天竺国僧书”可知,此书出版于 1584 年;内署“天竺国僧辑”表明其作者为罗明坚。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另有一份编号为 Jap.Sin I, 189a 的文献,为此书的影印版。

版本二,现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编号为 Jap.Sin I, 190, 书名为《天主实录》。此文献与 Jap.Sin I, 189 在个别称谓、用词上略有不同,而在整体内容上并无实质差异。此版本手稿还有一份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编号为 Borgia Cinese 324.1。

版本三,现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编号为 Jap.Sin I, 54, 书名为《天主圣教实录》。此书由阳玛诺(Manuel Dias Junior, 1574—1659)、费奇规(Gaspar Ferreira, 1571—1649)、孟儒望(João Monteiro, 1602—1648)重订,经值会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 1589—1653)批准后出版。笔者推断,此版应完成于 1637—1641 年,此时耶稣会已确立利玛窦传教路线为正统,遂对罗明坚的著作进行了较大改动,如将原版佛教词汇全部删除,修改教理内容表述,等等。此手稿亦有一编号为 Jap.Sin I, 55、内容残缺的复制品。

除以上中文教理著作外,还有一部罗明坚撰写的拉丁文教理书值得关注。此书现藏于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伊曼努尔二世馆,编号为 Fondo Gesuitico 1276,拉丁文书名为 *Vera et Brevis Divinarum Rerum Expositio*。

除上述完整的教义著作外,另有一份辅助性文献与《天主实录》的创作紧密相关,即收录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编号为 Jap.Sin I, 198 的《葡华词典》后面的附录文献。该附录文献有四页半(正反面共九页),其内容相对残缺零散,本文暂不做考察。

二、《天主实录》各版本研究概况

罗明坚完成了入华传教的首创性工作,其若干汉语著作也成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西学东渐”这一文化交流进程的初次尝试。罗明坚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虽因利玛窦的辉煌而略显暗淡,但仍有部分学者关注其人及《天主实录》的价值。

罗明坚相关的研究主要立足于两方面:一是以罗明坚及其著作为中心进行考察;二是以利玛窦为研究中心,通过二者对比,辅以对罗明坚的考察。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历史性和文献史层面的考察,鲜有深入罗明坚的思想世界内核及关注其著作内容的实质。研究者大多将《天主实录》当作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历史事件,而非作为哲学、宗教学术著作来深入文本分析。而且,在研究过程中,利玛窦的光环一直“笼罩”整个西学东渐史,利玛窦成为研究其他耶稣会士的不二标准。利玛窦之后的耶稣会士深受其影响,以其为参考尚有可取之处。但罗明坚为利玛窦先导,其工作恰为利玛窦成功的基石,过度强调罗明坚相对利玛窦在体系建构上的不足,在思想表述上的欠严谨,对中国文化理解的不到位,必将忽视罗明坚作为先行者、开创者的奠基、启发意义。

最早从事相关研究的主要是戴遂良(Léon Wieger)、德礼贤(Pasquale D'Elia)^①、裴化行(Bernard Henri Maitre)^②、陈纶绪(Albert Chan)^③、施省三(Joseph Shih)等学者。上述学者在其著作中都对罗明坚及《天主实录》有所涉及,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都没有专著讨论

① 德礼贤在其文章《关于第一本中文教理书的四个历史汉学》(*Quadro Storico-Sinologico del Primo Libro di Dottrina Cristiana in Cinese*)中对1584年《天主实录》做简要分析,重在考察各文本成书时间。Pasquale D'Elia, *Quadro Storico-Sinologico del Primo Libro di Dottrina Cristiana in Cinese*. Roma: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34, pp.193-222.

② 裴化行在《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一书中,对罗明坚《天主实录》的成书背景及其与拉丁文文本关系进行了初探。[法]裴化行著,萧清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③ 陈纶绪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和汉图书文献目录提要》(*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一书中列举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Albert Chan, *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 Armonk; New York M.E.Sharpe, 2002, pp.90-99.

此问题。唯有施省三在其用法文完成的博士论文 *Le Père Ruggieri et le problème de l'évangélisation en Chine*^① 中较为全面地考察了罗明坚在华传教工作和其著作情况,但由于特殊原因,其论文至今无法出版,自然也无中、英文译本,学界亦鲜有关关注其研究,遂以笔者水平,只能有针对性地考察其只言片语,难以了解其思想全貌。

近年来,张西平等国内学者亦开始着手挖掘罗明坚的思想价值,并发表了相关论文。张西平在《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②一文中,对罗明坚和《天主实录》做了相对全面的介绍,后在《罗明坚〈圣教天主实录〉拉丁文版初探》^③中对拉丁文教理书情况做了简介,又有文章对《葡华词典》后的附录文献进行研究^④。李新德在《从西僧到西儒:从〈天主实录〉来看早期耶稣会士在华身份的困境》^⑤一文中,通过对比《天主实录》和《天主圣教实录》来看早期耶稣会传教士传教策略的重大改变,但此文仍主要集中在传教历史领域的分析,对内容及概念的辨析略微单薄。梅谦立在《天主实义今注》中将《天主实录》与《天主实义》两文本进行比较,分析了两个文本在结构和内容方面的异同。^⑥

三、《天主实录》的作者及对罗明坚的评价误区

《天主实录》的作者本为罗明坚无疑,文本中明确记载“万历甲

① Joseph Shih, *Le Père Ruggieri et le problème de l'évangélisation en Chine*, Pontificiae Universitatis Gregorianae, 1964.

② 张西平:《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③ 张西平:《罗明坚〈圣教天主实录〉拉丁文版初探》,《基督教研究》,2015年第4期。

④ 张西平:《〈葡华辞典〉中的散文文献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⑤ 李新德:《从西僧到西儒:从〈天主实录〉来看早期耶稣会士在华身份的困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⑥ 梅谦立注,谭杰校:《天主实义今注》,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9页。

申岁秋八月望三日天竺国僧明坚书”^①。17 世纪阳玛诺等重新修订的《天主实录》也再次确定作者为罗明坚。最早对《天主实录》作者提出异议的是耶稣会学者邓恩(George H. Dunne),他在《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一书中提出,《天主实录》^②这本书是利玛窦和“中士”对罗明坚 1581 年拉丁文《问答集》的翻译和润饰。^③

邓恩的这一结论并非依靠切实的证据得出,更多的是基于主观的推测,是基于其对罗明坚汉语水平 and 对中国理解程度做出的推论。^④他将《天主实录》定性成利玛窦“汉语传教的首次尝试”^⑤,而再无罗明坚的功劳。此处暂不去考察邓恩的评价根据是否牢固,即便罗明坚有诸多不足,但在当时,其无疑是传教士中能力水平最高者,单就其只身一人叩开内地传教大门即可见一斑。作为罗明坚助手的利玛窦自然参与《天主实录》的创作工作,但其贡献十分有限。^⑥邓恩的推论未引起共鸣,此处特别提出,是因为其体现出的利玛窦中心倾向非个别现象。这种倾向在耶稣会学者中更为严重,为了维护利玛窦路线的核心地位,对与利玛窦意见相左的耶稣会传教士

① [意] 罗明坚著,钟鸣旦、杜鼎克编:《新编天主实录》,《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台北利氏学社,2002 年,第 6 页。

② 此处所谓《天主圣教实录》实际上是《天主实录》,为翻译上的失误。

③ [美] 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5—16 页。

④ 邓恩认为,罗明坚汉语水平不高、对中国理解不透彻,他如此评价道:“先打开中国大门的罗明坚,从此就再也没有返回中国。罗明坚在初次接触中国语言的学习的时候,比利玛窦的年龄要大。尽管他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由于记忆力的衰退,使他无法真正地掌握好中文。他为学习中文而付出的艰苦努力和他糟糕的健康状况,使他精力憔悴。虽然他还不到 50 岁,但是利玛窦谈到他说:‘他已经老了。’”详见[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 17 页。

⑤ [美] 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第 16 页。

⑥ 梅谦立在《天主实义今注》中说明了利玛窦的贡献在于其对宇宙九天的介绍。参见梅谦立注,谭杰校:《天主实义今注》,第 5 页。

(如罗明坚、龙华民)从主观上予以忽视,甚至不自觉地贬低。在这种倾向下,用思想“全盛”时的利玛窦作为尺度,“苛责”作为开创者的罗明坚,实难发现其思想亮点。

四、《天主实录》的初创完成情况

由于《天主实录》独特的思想史地位,考察其创作的背景、动机、基本策略等问题本身就是对于耶稣会士来华初期传教路线如何确定、中西文化如何创造性解释这些核心问题的探讨。而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的最佳材料无疑是罗明坚本人的相关书信。罗明坚在其1580年11月8日于澳门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麦尔古里亚诺神父(Everard Mercurian, 1573—1580年任耶稣会总会长)的书信中,第一次提到打算用中文创作天主教要理著作:

我希望不久对中国话能够运用自如,而后用中文撰写要理等书,这是为规划他们必须有的步骤。^①

可见,此时罗明坚撰写教义著作已经是经过深思熟虑,有了可行性计划的,不然也不会贸然地汇报给总会长。此后,罗明坚又于1581年11月、1583年2月两次致信总会长,汇报《天主实录》编写的情况,其中特别提及中国官员对其中文教理大纲大为肯定。^②他更在1583年2月7日于肇庆致信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Claudio Acquaviva, 1543—1615),阐述其中文传教的基本策略:“我利用明确的自然推理,并配以中国人的比喻给他们讲道。”^③

① [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台北光启文化出版社,1986年,第427页。

② [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第434页。

③ [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第446—447页。

罗明坚 1584 年 1 月 25 日于澳门致信总会长,记述了《天主实录》完成时的情况:

现在我已校正了我的《新编天主实录》,是用中文撰写的,用了四年工夫,曾呈献给中国官吏批阅,他们曾予我褒奖,要我赶快印刷,越快越好;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笔者注)与其他神父都审查了一番,认为没有问题,也要我快去印刷。因为要改正一些句子,迟延到今年方能出版,如托天主之福今年能出版的话,将把它翻译为拉丁文,明年再给神父寄去。^①

信中记述了中国官员对其传教工作的认可与支持,这种态度应该不是罗明坚主观上的乐观估计。传教士千辛万苦方能叩开中华的大门,同时代的日本在逐步收紧对天主教的宽容政策,远东的耶稣会传教士整体的态度自然是小心谨慎,绝不敢妄作推论。虽然罗明坚与王泮、陈瑞等广东地方官员的友谊非一朝一夕建立,但他们一定是切实认识到罗明坚带来的天主教教理是能容于当时思想环境的,因此才会大力鼓励其尽快出版。这其中既有罗明坚的努力,亦可从某一侧面显见晚明思想环境对外来文化的宽容与理解。

综上,罗明坚创作《天主实录》是一项系统、有计划的工作,前有一系列简单教义材料撰写做铺垫,后经与“中士”交流不断地修改完善。罗明坚本人和教会也对此工作高度重视,其能经常向会长报告项目进展就是侧面的证明。最值得注意的是,罗明坚在创作《天主实录》时并不是盲目尝试的,其已主动选择好了在华传教的基本策略,即信中提到的“利用明确的自然推理,并配以中国人的比喻”。当然,路线的选择必受教会正统的影响^②,其本人也汲取了远东传教

① [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第 457 页。

② 特伦特大会(Council of Trent)后,当时教会奉“托马斯神学”为正统,其神学的一大基本特点是强调理性神学的论证。

士前辈的经验,但其中罗明坚的判断选择却是决定性的。两条策略之所以能在《天主实录》中呈现并由利玛窦等后继者不断发扬,其最为必要的条件不在于西学,而在于中国士人能否接受。罗明坚通过阶段性的尝试,清楚判断出了晚明思想环境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和接受程度。其信中描述的以广东地方官员为代表的“中士”对耶稣会士及其带来的西学都持有友善、宽容、理解的态度,无疑给耶稣会总会和教廷在远东传教问题上打了一针兴奋剂。罗明坚通过自己的努力,搭建起了第一座中西交流的桥梁,并且给出了天主教思想可以在中国传播的肯定判断,成为整个明末“西学东渐”乃至“汉学西传”得以开展的前提。

五、《天主实录》概述

《天主实录》确为罗明坚创作的最为重要的作品,该书完成于1584年。通过上文材料可知,早在1581年前后,罗明坚便开始着手这本中文要理书的写作工作。“天主实录”即“讲述与天主相关的实情”,也就是阐述天主教基本教义。罗明坚1583年2月7日于肇庆致信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提到:

目前我已撰写了几本要理书籍,其中有《天主真教实录》(*Doctrina*)、《圣贤花絮》(*Flos Sanctorum*)、《告解指南》或《信条》(*Confessionario*)与《要理问答》(*Catechismo*)等。这一切都是尊视察员神父(范礼安——笔者注)与其他神父的意思而撰写的,并让我印刷,这样把天主教义的大纲介绍给教外人,方能引导他们进教。^①

① [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第446—447页。

文中提及的《要理问答》应该指《天主实录》，而其中的《天主真教实录》《圣贤花絮》《告解指南》或《信条》，目前学界暂不知晓其下落。但罗明坚确实曾将十诫、祈祷文翻译为中文。耶稣会士在传播天主教信仰时，针对不同群体撰写不同类型的书籍。“Catechismus”（要理书）针对教外人士，用理性论说的方式向教外人士讲述与天主教相关的问题；“Doctrina”（教理书）则多针对信徒，为他们讲述天主教信仰上的教义、准则，如受洗、戒律等问题。但是在传教操作中，这两类著作并不是完全分割、独立的，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实际上，《天主实录》就是一本“要理书”和“教理书”的混合体，既有中士（教外人士）和西士（传教士）的对话来阐述基本信仰，又有圣水除罪、基本诫命等信徒需持守的教义。而在《天主实录》后，耶稣会已开始注重“教理书”和“要理书”的区分，利玛窦的《天主实义》可以说是耶稣会汉语要理本的巅峰之作，之后，他又创作了《天主教要》，作为针对中华信徒的教理本。^①

《天主实录》共十六章，大致从五个方面介绍天主教教理教义：

1. 关于天主论，包括著作中的《真有一位天主章之一》《天主事情章之二》《解释世人冒认天主章之三》；
2. 关于创世论，包括《天主制作天地人物章之四》《天人亚当章之五》；
3. 关于灵魂论，包括《论理人魂不灭大异于禽兽章之六》《解释魂归四处章之七》；
4. 关于天主救恩史内容，包含《天主自古及今止有三次降其规诫三端章之八》《天主降世赋人第三次规诫章之九》《解释第三次与人规诫事情章之十》《解释人当诚信天主实事章十一》；
5. 关于天主教徒的信仰生活，包括《天主十诫章十二》《解释第一碑文中有三条事情章十三》《解释第二碑文中有七条事情章十四》《解释僧道诚心修行升天之正道章十五》《解释净水除前罪章十六》。

^① 梅谦立注，谭杰校：《天主实义今注》，第4—5页。